

强市场中的“弱参与”： 一个公民社会的考察路径^{*}

陈福平

提要:本文通过对市场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发育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们自主空间的释放,推进了公民参与的发展。然而当我们把这种“空间释放”控制之后,从宏观的表现上看,公民参与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也产生了一种抑制效应。同时我们还发现,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公民参与网络发展从而提高社会资本的能力愈趋于弱化。作者认为,公民间的相互合作与参与网络的建立,不应该仅仅表现为一种“原子化”参与能力的提高,只有增强人们彼此间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才能真正推进公民社会健康有效的发展。

关键词:市场经济 公民社会 自主空间 合作精神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公民参与一直被视为公民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因此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学者注意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公民参与水平是不一样的(Almond & Verba, 1963; Putnam, 1993; Wuthnow, 1991; Schofer & Fourcade-Gourinchas, 2001),而背后的原因则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当代中国,许多学者提出市场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个体自主能力得到了提高,尤其是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带来更多参与路径等自主空间的释放,从而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出现。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市场的发展对公民社会也存在着某种抑制性,例如机会主义的出现、合作传统的遗失、社会信任的降低,等等。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市场发展是否带来了人们公民参与的繁荣,其中又有哪些可能的因素对这种繁荣或抑制产生了影响,同时本文也将对当代中国各个地区间的公民参与进行比较分析,进而阐释宏观层面的市场发展是如何对人们公民参与差异造成影响的。

^{*}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蔡禾教授、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黎熙元博士的探讨与启发,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梁玉成博士给予了计量上的指导,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07级博士生李超海、许涛也对本文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本文所有可能的责任由作者承担。

一、市场化背景下的公民参与：一个争议的话题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市场经济得到空前发展,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将逐渐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公民社会的社会状态。对于公民社会,学者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其中有关公民社会的特征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1)公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公民社会的内在联系内生于市场经济平等自治的契约关系;(3)公民社会遵循法原则;(4)公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公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公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邓正来,1996)。从公民社会的特点来看,对于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一些国内学者也乐观地将市场经济作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基础,不断地创造着其发展的良好空间(方朝晖,1999;高兆明,1999;储建国,1999;田忠,2001;俞可平,2006;张喜红,2007)。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同样也有富裕的社会将拥有更多公民社会特性的观点(Gellner,1994;Bellah et al.,1991;Bellah et al.,1981)。然而也有学者提出批评意见,认为:“虽然市场经济有助于消除专制集权控制,为社会成员自由的社会活动创造空间,但是它却无法提供社会价值的产生空间,也不能培育出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相反市场的内在运作机制所具有的恰恰是对它们的损害作用和对社会成员原子化与机会主义倾向的诱发”(陶传进,2003)。因此,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成为一个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中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焦点。

对于以上观点我们注意到,争议的双方在市场经济对于公民个体自主空间的理解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清楚地阐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将给予人们自由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平等契约关系的经济,这首先要求参与的行动主体拥有人身的自由权利和能力,“因此只有在个人能够自由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时,公民社会才能繁荣起来。为公民社会形成提供机会的是市场而不是国家,因为个人满足自然欲望的能力受到限制时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来超越”(潘恩,2005:79)。溯及到更早的黑格尔,公民社会是物质生活条件的领域,是自然必然性的产物。在公民社会里,各个人是以自私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的,从本质上说,公民社会就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黑格尔,

1961:124)。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使得人们物质利益关系活跃起来的重要社会机制之一。事实上,当我们考虑到中国经济转型的更大背景时,这种个体自主能力的解放也内含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特征。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体制对整体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城市居民生活中,单位常常是主导的因素,居民都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个人自主空间往往有限。计划经济不仅是对物质产品的计划生产,也是对人和人的生活的计划安排。市场经济建构起来后,产品和人都无法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安排了,人在市场上活动,需要社会成员自己选择,没有人能够代劳。选择空间的拓展带来了人们自主能力提高的需求,有了这种自主能力,对于一种既定安排的模式就难以接受了。人在市场上形成的自主性,必然会带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当社会越来越充分地、从国家垂直体制中分化出来的时候,个人就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自由空间和自主支配的资源;当社会内部进一步分化的时候,人们的兴趣、利益、地位也都在分化,于是就有越来越普遍的“人以群分”的结社(高丙中,2006)。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学者们都认同的假设: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自主能力得到了提高、自主空间得到了释放,从而带来了公民社会的推进。

争议双方的焦点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带来了人们相互关系的融合?事实上从齐美尔等古典社会学家的讨论开始,就引发了关于商品与市场经济发展对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思。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和主导精神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在对待人和事物时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基于这种态度,形式公正经常与不为他人着想的冷漠结合在一起。货币借助“多少钱”表达了所有物质之间的不同。货币以它那无色彩性和中立性变成了所有价值的共同单位,它不可避免地挖空了事物的核心、个性、特殊价值和不可比性。这种冷漠的结果是,我们甚至经常不能清晰地知道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邻居的那些人(齐美尔,2007:21-25)。而陶传进对于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之间矛盾的论证,更是引用了奥尔森的主要观点来对其进行批判。奥尔森发现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他通过对复杂世界的观察,发现之前大家所公认“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扩大集团利益的倾向”的观点是错误的。集团利益的共同性导致“搭便车”现象,理性的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而后他对集团进行了细分,分为相容性集团和排他性集团,并提出相容性集团较排他性集团更有可能实

现集体的共同利益的观点。由此陶传进(2003)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带来了人们自主能力的提高,但同时也使人们自利心理增强,从而最终损害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破坏了公民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基础。因此,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件“悬案”。

二、公民社会与公民参与

在当代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研究中,美国学者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研究得到了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普特南提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Putnam,1993)。社会资本的存量就是一个社区中人们参加、参与社团活动的水平,指标包括读报、参与志愿组织以及投票等。“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等……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Putnam,1993)。通过这种社会参与,个人与社会连接起来,由此产生的社会资本是西方公民社会得以成型和运作的基础。社会资本产生于志愿性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

在普特南的研究中,公民参与网络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的框架。他同时还分析了作为公民参与网络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在一个共同体中,此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了共同利益的合作。其次,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的流通,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第三,密集但彼此分离的垂直网络维持了每一个集团内部的合作,而公民参与网络则跨越了社会的分层,滋养了更广阔的合作。因此,普特南提出,“如果说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那么,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Putnam,1993:203-204,206)。事实上,有许多学者在公民参与研究中都表达了与普特南相一致的观点:公民参与和

社团活动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Berry, 1997; Gamwell, 1984; Green, 1993; Hirst, 1994; Portes, 1998; Smith, 1990; Tester, 1992)。对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设而言,考察公民参与的程度和深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了解和反映我们公民社会发展的内在结构与变化。

三、数据与测量

(一) 研究设计

基于以上的理论讨论和研究思路,我们提出了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自主能力增强):个体的自主能力对公民社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 2(自主空间释放):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公民自主空间释放对公民社会发展的推动效应越强。

假设 3(合作精神衰弱):在当代中国,控制了公民自主空间释放效应的影响后,市场经济发展对公民社会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操作化:

1. 在这里,我们将个体自主能力的概念操作化为两个方面的指标:教育和收入。

2. 自主空间的释放,这一概念实际上表达了个人的资源动员空间在增强,例如参与活动的路径多样化、参与活动的可能性增强。这就意味着,教育程度和收入相同的公民,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参与程度要高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我们通过市场化与教育和收入的交互项来分析这一变量的作用。

3. 我们将“市场经济发展”的概念通过市场化程度指数进行具体的量化。

4. 通过对普特南研究的借鉴和引申,我们将“公民社会”的概念定义为公民参与的程度。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个待模型验证的推论。

由假设 1 得到推论 1:教育程度越高的社会成员,其公民参与程度越高;推论 2:收入水平越高的社会成员,其公民参与程度越高。

由假设 2 得到推论 3: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与低的地区相比,相同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社会成员的参与程度越高,那么市场化

与教育和收入的交互项则为正数,反之则为负数。

由假设 3 得到推论 4:在当代中国,当控制了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成员自主空间释放效应后,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对于公民参与的程度具有负向影响。

(二) 统计模型与使用数据

本研究中使用了多层次模型统计方法,其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1. 个体层次

$$Y_{ij} = \beta_0 + \beta_1 X_{1ij} + \beta_2 X_{2ij} + \dots + \beta_k X_{kij} + r_{ij}$$

在分析中,个体层次的主要变量 X_{kij} 为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收入、婚姻、职业、政治面貌、社区类型。 β_k 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r_{ij} 为方程残差。

2. 省份层次

$$\beta_0 = \gamma_0 + \gamma_1 W_{1j} + u_{0j}$$

$$\beta_1 = \gamma_1 + \gamma_2 W_{1j} + u_{1j}$$

在二水平的省级层次,主要的变量 W_{1j} 为市场化程度。其对于因变量的影响主要在两个层次上,一是截距层次,即 β_0 方程所示, γ_0 、 u_{0j} 为截距层次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残差;二是斜率层次,即 β_1 方程所示, γ_2 、 u_{1j} 为斜率层次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残差。其分别反映了二层次变量市场化程度对因变量的直接结构效应(二层次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和间接结构效应(由于二层次变量的作用,使得个体层次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具有结构性差异)。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图 1 所示的模型计量路径。

本文主要使用 CGSS2005 数据中的居民问卷进行研究。数据样本 10376 个。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调查是一项连续性的中国基本社会状况调查项目,主要目的是了解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城市居民的就业、教育、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状况。

CGSS2005 数据由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组提供,在此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表示感谢。样本与调查的具体情况参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网站:<http://www.chinagss.org/index.ph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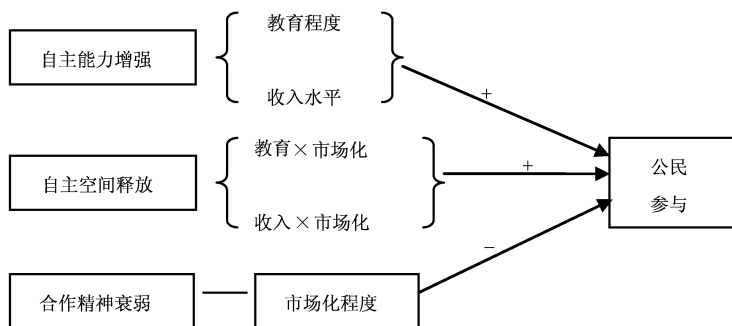


图 1 市场经济与公民参与模型的计量路径

(三) 测量变量

1. 因变量

因变量主要通过对几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公民参与因子而形成。问卷中具体的问题为：“在业余时间里，您有没有在以下方面参加由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如俱乐部沙龙、培训班、志愿团体、教会等）安排/进行的活动呢？”问题选项为量表测量，在这里我们将“从不”、“一年几次”、“一月一次”、“一周一次”、“一周几次”赋值为 0 - 4 后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如表 1 所示的公民参与因子。不同于西方学者对公民参与研究主要以个体隶属于志愿团体的成员关系（Membership）为参与的衡量，本文主要是以个体公民参与的频率作为衡量，前者意在反映公民参与的广度，而我们则重点关注公民参与的深度。

2. 自变量

(1) 个体层次变量

一些研究也发现公民参与受到一些个体变量的影响，如教会、宗教信仰、教育、收入水平、性别和婚姻状态、居住的社区类型等因素（Curtis, 1971; Cutler, 1976; Greeley, 1997; Knoke, 1986; Knoke & Thomson, 1977; Scott, 1957）。在性别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加倾向加入性别隔离的群体，同时具有更高的社团忠诚度，从而提高了其公民参与的水平（Popielarz, 1999）。年龄方面的结论则是中老年人的参与程度最广泛（Cutler, 1976; Curtis et al., 1992）。在就业状态上，洛托罗和威尔森研究分析更长的稳定工作状态将使得个人拥有更高的社团参与关系（Rotolo & Wilson, 2003）。因此，如表 2 所示，个体层次的变量主要包括类别变量中的性别、婚姻状况、职业状态、政治面貌、居住社区类型，以及连续

表 1 公民参与因子

项目(活动参与频率)	因子负荷值 (Factor Loadings)	共同度 (Communality)
健身/体育活动	.503	.710
娱乐/文艺活动	.547	.739
同学/同乡/同行联谊活动	.545	.738
宗教信仰活动	.029	.169
有助于增进培养/教育子女能力的活动	.364	.603
有助于提高个人技能/技术的活动	.592	.769
公益/义务活动	.539	.734
特征值(Eigenvalue)	3.118	
累积方差(Cumulative Variances)	44.539%	

表 2 个体层次变量基本描述统计

类别变量			类别变量		
	样本数	有效百分比(%)		样本数	有效百分比(%)
性别			居住社区类型		
			城市	6098	58.8
女性	4919	47.4	农村	4274	41.2
婚姻状况			连续变量		
无配偶	1599	15.4		平均值	标准差
有配偶	8771	84.6	年龄	44.7011	14.79441
职业状态			年龄平方	2217.0434	1417.41983
非在职	2452	23.6	受教育年限	8.050622	4.517366
在职/在学	7920	76.4	收入	741.2038	1280.40741
政治面貌			收入对数	5.4976	2.22638
非党员	9252	89.2			
党员	1120	10.8			

变量中的年龄、年龄平方(以探寻年龄变量的非线性效用)、受教育年限、收入对数,其中除了受教育年限与收入对数作为我们所要探寻的假设变量外,其他个体层次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我们的统计模型。

(2) 省份层次变量 —— 市场化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用了市场化指数来反映各地区间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如表 3 所示,这里的市场化指数主要来自樊纲等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06 年报告》。该报告主要对 2005 年度各省份的市场发育状况进行了评估,其中指数的构造

表 3 2005 年各省(市、自治区)市场化程度指数

省份	市场化指数	省份	市场化指数
甘肃省	4.44	湖南省	6.55
贵州省	4.57	安徽省	6.56
陕西省	4.8	湖北省	6.6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02	四川省	6.86
山西省	5.26	重庆市	7.23
黑龙江省	5.26	辽宁省	7.84
云南省	5.51	山东省	8.21
内蒙古自治区	5.52	天津市	8.34
海南省	5.54	北京市	8.62
广西壮族自治区	5.82	福建省	8.62
吉林省	5.89	江苏省	9.07
河南省	6.2	浙江省	9.9
江西省	6.22	广东省	10.06
河北省	6.41	上海市	10.41

主要通过五个方面的内容形成,分别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樊纲等,2006:13-76)。也有学者使用其他经济成分的职工人数占全体职工人数(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城镇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比例作为市场化的指标,其指标与樊纲等所建立的指标相关系数为0.858(郝大海、李路路,2006)。

四、研究发现

(一) 公民参与的地区差异

各省之间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是否就意味着不同地区

事实上,我们也使用了该项指标作为二层变量市场化的测度,纳入于统计模型之中发现,无论使用哪个指标做衡量并不影响本文结论。

表 4 公民参与的地区间比较(GLM N= 103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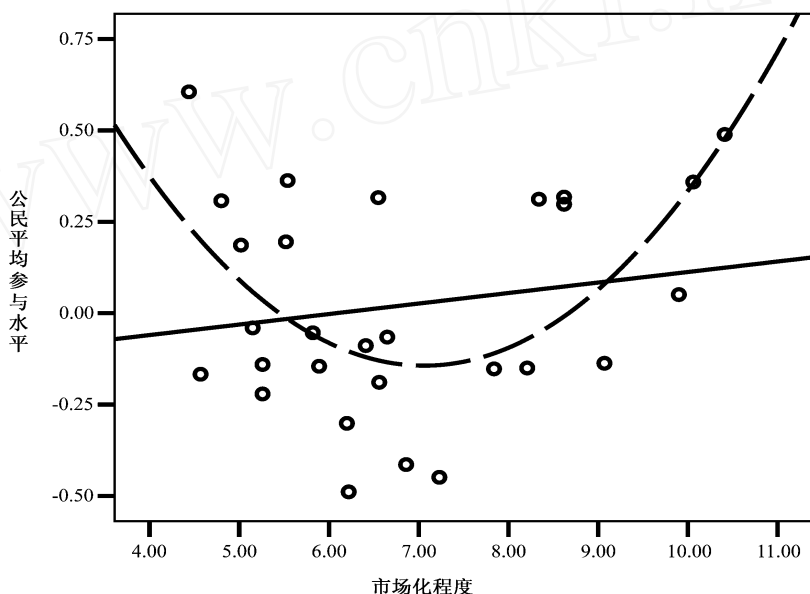
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包含控制变量)			
省份		省份		省份		省份	
天津	- .041	河南	- .637***	天津	- .062	河南	- .150***
河北	- .402***	湖北	- .413***	河北	.042	湖北	.038
山西	- .473***	湖南	- .034	山西	- .051	湖南	.291***
内蒙古	- .179**	广东	.023	内蒙古	.231***	广东	.317***
辽宁	- .511***	广西	- .364***	辽宁	- .154**	广西	.031
吉林	- .479***	海南	- .060	吉林	- .129*	海南	.218**
黑龙江	- .551***	重庆	- .769***	黑龙江	- .255***	重庆	- .324***
上海	.184***	四川	- .739***	上海	.131**	四川	- .163***
江苏	- .478***	贵州	- .499***	江苏	- .093*	贵州	- .045
浙江	- .278***	云南	- .379***	浙江	.213***	云南	.035
安徽	- .522***	陕西	- .028	安徽	- .140**	陕西	.293***
福建	- .037	甘肃	.254***	福建	.274***	甘肃	.617***
江西	- .827***	新疆	- .154	江西	- .267***	新疆	.003
山东	- .476***			山东	- .106*		
Adj-R ²	7.61 %			26.52 %			

注:北京为参照组; *P<.1; **P<.05; ***P<.01 (双尾检定)。

之间的公民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呢?表4的两个方程模型反映了公民参与水平的地区差异。第一个模型是以公民参与为因变量,省份作为自变量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以北京作为参照组)。我们看到公民参与水平高于北京的省份有上海、广东、甘肃。在这个模型中,只使用单一自变量——省份,其预测公民参与的解释力达到7.61%,这意味着我们在考虑公民参与的问题时,不能忽视地区的结构性差异。而第二个模型则是包含了控制变量的以公民参与为因变量、省份以及相关控制变量的方程模型。统计显示出以北京为参照组时,公民参与水平高于北京的地区有内蒙古、上海、浙江、福建、湖南、广东、海南、陕西以及甘肃。

单一自变量为类别变量的一般线性回归方程,即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方差分析。由于篇幅关系,同时后文表格中将列出相关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在此没有列出控制变量与截距项。如有需要可发送电子邮件至:chenfuping1224@tom.com 向作者索取。

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在公民参与水平高于北京的省份中,既有市场化程度高于北京的福建、广东、浙江,也有市场化程度低于北京的内蒙古、湖南、海南、陕西、甘肃,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与公民参与的程度呈不均衡性发展。在图2中,通过对各省(市、自治区)公民参与水平与市场化程度的拟合线的观察,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现象。各省(市、自治区)公民参与的平均水平与市场化程度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其表现为一个开口向上的正U型曲线。随着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推进,人们的公民参与水平是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



注:线性拟合: $R^2 = 0.016, F = 0.339, \text{Sig.} = 0.534, df_1 = 1, df_2 = 24, Y = -1.326 + 0.220X$
 二次函数拟合: $R^2 = 0.358, F = 6.418, \text{Sig.} = 0.006, df_1 = 2, df_2 = 23,$
 $Y = 29.497 - 8.671X + 0.604X^2$

图2 各省(市、自治区)公民平均参与水平与市场化程度的拟合曲线

在图3中,我们将各省份每万人中的社团数量与各省份的公民

各省社团数量分布资料,请参看国家民间管理局网站(<http://www.chinanpo.gov.cn/web/index.do>)。这里我们根据各省人口状况,根据公式:各省每万人中社团数量=(各省社团数量/各省人口数量)×10000计算,就得到了一个各省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的数量指标。

平均参与水平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同样不是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如果把在国家正式部门登记的社团数量作为宏观的参与水平标志,而在本文所测量的公民个体参与上,却并没有发生与之相对应的变化。从结果上可以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程度越高的省份,人均拥有社团的数量是不断上升的。这与公民参与和市场化程度的关系是有差异的。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种差异性呢?我们需要在统计模型中考虑宏观变量对微观行动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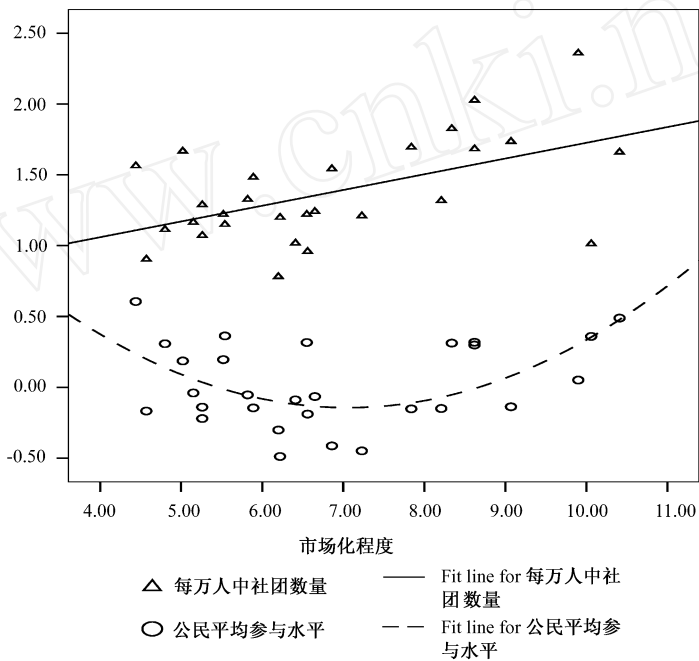


图3 各省(市、自治区)社团数量与公民参与水平的比较

(二)影响公民参与的因素分析

表5的结果显示了影响居民公民参与水平的不同层次变量的作用。在三个模型中,个体层次变量均对居民公民参与程度有显著影响。在性别上,女性较之于男性拥有更高的公民参与水平。我们的研究结果同时显示了年龄对于公民参与的影响呈现出开口向上的正U形曲线,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的公民参与水平是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在政治面貌方面,党员比非党员的公民参与水平高,在职的比

非在职的社会成员拥有更高的参与水平。而在婚姻状况方面,无配偶的比有配偶的居民倾向于拥有更高的公民参与水平。同时我们也看到,城市居民要比农村居民具有更高的公民参与程度。

表 5 影响居民公民参与程度因素的多层次模型

影响居民公民参与程度的因素分析(Multilevel Statistical Model N = 9931)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个体层次变量	S. E	S. E	S. E
性别 ^a	- .036 [†] (.018)	- .036 [*] (.018)	- .029 [†] (.018)
年龄	- .023 ^{***} (.004)	- .023 ^{***} (.004)	- .024 ^{***} (.004)
年龄平方/100	.020 ^{***} (.004)	.020 ^{***} (.004)	.020 ^{***} (.004)
教育程度	.043 ^{***} (.002)	.043 ^{***} (.002)	.039 ^{**} (.020)
收入对数	.029 ^{***} (.004)	.029 ^{***} (.004)	.019 ^{**} (.008)
政治面貌 ^b	.196 ^{***} (.029)	.196 ^{***} (.029)	.190 ^{***} (.029)
职业状态 ^c	.159 ^{***} (.025)	.159 ^{***} (.025)	.146 ^{***} (.024)
婚姻状况 ^d	- .126 ^{***} (.027)	- .126 ^{***} (.027)	- .118 ^{***} (.027)
社区类型 ^e	.516 ^{***} (.023)	.516 ^{***} (.023)	.521 ^{***} (.022)
省级层次变量			
市场化程度	- .001 (.025)	- .605 ^{**} (.189)	- .037 [*] (.016)
市场化程度平方	— —	.041 ^{**} (.013)	— —
交互项			
市场化 [*] 教育程度	— —	— —	.006 ^{***} (.001)
市场化 [*] 收入对数	— —	— —	.004 ^{***} (.001)
截距	- .362 [†] (.192)	1.735 ^{**} (.672)	.958 ^{**} (.378)
模型拟合度(BIC/df)	25598/13	25605/14	25481/14

注:参照组:a 女性; b 非党员; c 非在职; d 无配偶; e 农村。

P < .10; *P < .05; **P < .01; ***P < .001 (双尾检定)。

在这里,我们更加要关注的变量是收入、教育程度以及省级层次变量市场化程度。在三个模型中,对于收入和教育而言,都呈现出了相同的结果,那就是收入和教育程度越高居民的公民参与水平越高。我们的研究假设 1 和推论 1、推论 2 得到了证明。柯提斯等学者在研究不同国家社团参与水平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其对此的解释是,教育程度

和收入水平越高,意味着个体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参与到社团生活中来(Curtis et al., 1992)。英格哈特同样认为,社会越工业化,个体教育水平和财富、收入越多,越强调“超物质”价值的生活状态、容忍度和信任,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公民参与发展(Inglehant & Baker, 2000)。

而对于市场化程度这一省际层次变量而言,我们看到三个模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结果。在模型 1 中,市场化程度对于居民的公民参与不具有线性的影响。这与我们之前对不同省份之间公民参与水平所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模型 2 中,我们在宏观层次变量中加入了市场化的平方项,来探寻其对于公民参与的非线性效应。结果也同时印证了我们在前文中的研究结论,市场经济发展与公民参与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其表现为一个开口向上的正 U 型曲线。因此,我们基于假设 2 和推论 3,在方程中加入了市场化程度与收入和教育的交互项,交互项说明了市场化程度与收入和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模型 3 印证了我们的假设。我们看到交互项的影响为正,这表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带来了人们自主空间的释放,从而对公民参与程度产生了正向影响。然而在此时,控制了这种人们自主空间释放的因素后,我们发现在模型 3 中,市场化程度对于公民参与程度的影响变为了一种负向影响。这样我们的研究假设 2 和推论 3 也得到了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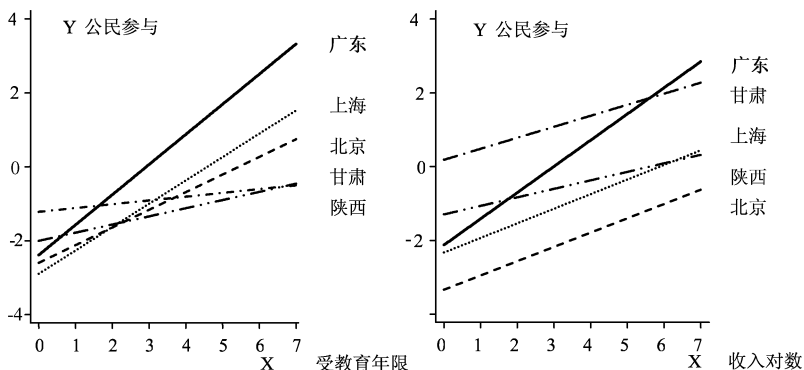


图 4 以五个省份为例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公民参与影响的拟合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结论,图 4 以五个省份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公民参与影响的拟合情况为例,说明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我们

看到在图4中,相对于甘肃、陕西而言,广东、上海、北京的拟合线具有较高的斜率,而甘肃、陕西具有较高的截距,这意味着从公民参与的水平来看,甘肃、陕西的公民参与水平具有较高的“基准”(以 $X=0$ 时为基准)水平,然而随着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两个省份在教育与收入对于公民参与的“贡献率”(斜率)上比其他三省市低,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人们教育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在未来可能的结果是广东、上海、北京的公民参与水平将逐渐高于甘肃与陕西。这就意味着,在讨论市场经济发展对于公民社会的影响时,我们不但要看到不同市场状态下人们自主能力提高对于公民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同时也要注意发展的“基准”。

(三)进一步的探讨：“原子化”的个人参与？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得到了对于假设1和假设2的一个经验证实,那就是市场经济发展在宏观上看的确存在着对于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公民参与的抑制效应。然而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否是市场经济发展使得人们对于集体性合作行为的排斥导致了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考虑另一种公民社会的研究路径,在普特南的研究中,公民参与网络本身是一种产生普遍信任与互惠等社会资本的行动机制。帕克斯通认为,普特南的研究只关注个体层次的信任,而并无证据显示美国公民的制度信任和社团信任正在下降(Paxton, 1999)。因此,我们仍要回归于社会资本的内在含义才能解释公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问题。正如林南对社会资本所下的定义,“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 2006:24)。因此,社会资本作为一个资本的概念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要有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二是资源是从该社会网络中获得的。据此林南指出了普特南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不足,“作为一个关系的财产,必须与集体财产和物品,如文化、规范和信任等分开来”(林南, 2006:25)。刘林平认为,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源而不直接等同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动用了的、用来从事生产性的经济活动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源(刘林平, 2006)。

本文赞同并借鉴了林南和刘林平的观点,应将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从宏观意义上的普遍信任与公民互惠回归到网络之中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际上可以将公民参与视为“形式性的社会资本”,而由参与网络所形成的信任、互惠才是一种“实质性的社会资本”。在这一点上,

我们认为“实质性社会资本”比“形式性社会资本”更为重要,后者才是由具体网络所产生和行动者获得的网络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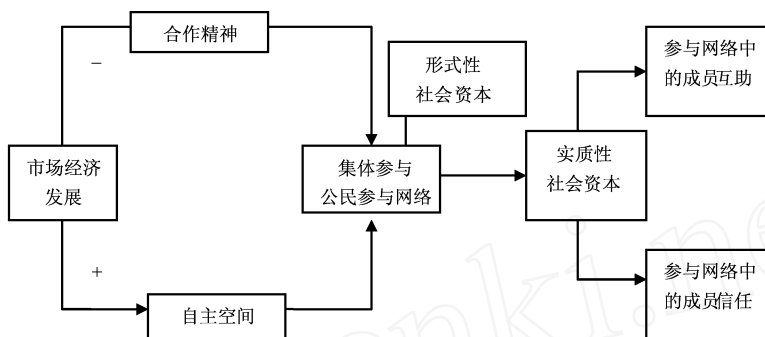


图5 从市场发展到公民社会的路径

当回到我们前面所论证的基本假设——市场经济发展正在弱化公民的合作精神时,可以提出一种新的论证视角。如果合作精神正在弱化,那么公民参与将呈现出某种“原子化”的状态,例如,社会成员的参与只是为了获得某种自我能力的增长(教育培训)和生活压力的舒缓(俱乐部、沙龙),而在参与活动之外,人们并没有产生更多的联系。如果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这种“原子化”状态的参与越强,那么,我们可以设想,由公民参与网络生成“实质性社会资本”的能力也将越趋于弱化。这样的研究路径蕴含了两个好处,一是将普特南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落到了具体的网络层面;二是合作精神是参与网络的内生变量,而由参与网络所生成的互惠和信任是更加内在地受到合作精神这一价值观念的影响的。这就避免了一些政治与社会环境差异等外生变量对研究路径的干扰。由此,我们形成了如图5所示的分析框架。我们将“实质性的社会资本”操作化为“参与网络中的公民互助”和“参与网络中的公民信任”,而公民参与网络是形成二者的行动机制,其可以表述为假设4:如果市场经济确实在弱化社会成员的合作精神,那么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公民参与网络(形式性社会资本)生成的成员互助和成员信任(实质性社会资本)的能力就越弱。

表6和表7分别是对参与网络中成员各项活动外互助程度和信任程度的因子分析。问卷中的互助程度测量的具体问题为:“您说您参加

过——(读出选项),那在这个活动之外您与其他参与者之间有没有互助行为呢?”同样采用里克特量表格式,在这里我们将“没有”、“偶尔有”、“有时有”、“较多”、“很多”赋值为 0 - 4 后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了参与网络中成员的互助因子。而问卷对信任程度测量的具体问题为:“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在这里我们将“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同样赋值为 0 - 4 后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了参与网络中成员信任因子。

表 6 参与网络中成员互助因子(主成分因子分析 PCF)

项目(活动外互助频率)	因子负荷值 (Factor Loadings)	共同度 (Communality)
健身/体育活动	.458	.677
娱乐/文艺活动	.530	.728
同学/同乡/同行联谊活动	.457	.676
宗教信仰活动	.209	.457
有助于增进培养/教育子女能力的活动	.495	.703
有助于提高个人技能/技术的活动	.503	.710
公益/义务活动(如扶贫、社会救济、赈灾、扫盲、环保等)	.409	.640
特征值(Eigenvalue)	3.061	
累积方差(Cumulative Variances)	43.731 %	

表 7 参与网络中成员信任因子(主成分因子分析 PCF)

项目(对于活动成员的信任)	因子负荷值 (Factor Loadings)	共同度 (Communality)
一起参加文娱、健身、进修等业余活动的人士	.857	.265
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	.855	.269
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公益活动的人士	.861	.259
特征值(Eigenvalue)	2.206	
累积方差(Cumulative Variances)	73.54 %	

如表 8 所示,我们分析了影响参与网络中成员互助和信任程度的因素。模型 1 - 3 为参与网络中成员互助程度的影响因素统计模型。模型 1 和模型 2 使用了一般线性回归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个体层次上,公民参与程度对于参与网络中成员的互助具有正向影响,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同时方程的解释能力由 23.89 % 上升到 81.96 %,也就是说,公民参与的程度可以解释近 60 % 的参与网络中成员的互助

表 8 影响参与网络中成员互助与信任程度因素的多层次模型 (GLM & HLM)

自变量	参与网络中成员互助程度 (N = 9931)			参与网络中成员信任程度 (N = 4240)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个体层次变量						
性别 _a	β -.037* {.018}	β -.007 {.009}	β -.008 {.009}	β .028 {.032}	β .028 {.032}	β .029 {.031}
年龄	β -.021*** {.004}	β -.002 {.002}	β -.002 {.002}	β .001 {.006}	β .002 {.006}	β .003 {.006}
年龄平方/100	β .019*** {.004}	β .001 {.002}	β .001 {.002}	β .002 {.007}	β .001 {.007}	β .001 {.007}
教育程度	β .043*** {.002}	β .010*** {.001}	β .010*** {.001}	β .004 {.005}	β .002 {.005}	β -.001 {.005}
收入对数	β .038*** {.004}	β .011*** {.002}	β .010*** {.002}	β .027*** {.008}	β .025*** {.008}	β .013 {.008}
政治面貌 _b	β .248*** {.030}	β .067*** {.015}	β .058*** {.014}	β .119* {.053}	β .111* {.053}	β .118* {.051}
职业状态 _c	β .178*** {.025}	β .044*** {.012}	β .049*** {.012}	β -.018 {.044}	β -.023 {.044}	β -.028 {.043}
婚姻状况 _d	β -.086*** {.027}	β .020 {.013}	β .023 {.013}	β .019 {.045}	β .022 {.045}	β .027 {.044}
社区类型 _e	β .519*** {.023}	β .067*** {.011}	β .069*** {.011}	β -.004 {.041}	β -.021 {.042}	β -.042 {.043}
公民参与	β —	β .860*** {.005}	β 1.017*** {.079}	β —	β .044** {.015}	β .256** {.098}
交互项						
市场化 × 公民参与	β —	β —	β -.019* {.011}	β —	β —	β -.026* {.013}
截距	β -.460*** {.090}	β -.180* {.044}	β -.132*** {.070}	β -.256 {.157}	β -.252 {.157}	β -.156 {.162}
Adj-R ²	23.89%	81.96%	11164/15	.63%	.80%	—
模型拟合度 (HIG/d ^f)	—	—	—	—	—	12035/15

注: 参照组: _a 女性; _b 非党员; _c 非在职; _d 无配偶; _e 农村。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双尾检验)。

行为。因此,在具体网络资源流动的层次上,普特南所强调的互惠这一“实质性的社会资本”同样得到了验证。而在模型3中我们加入了市场化程度与公民参与程度的交互项。这一变量反映了二层次变量的市场化对于公民参与和参与网络中成员互助之间方程斜率影响的结构效应。如模型3所示,这种结构效应的影响为负向,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公民参与程度对于网络中的互惠行为的正向产生能力越趋于弱化。

模型4-6反映了参与网络中成员信任程度的影响因素。模型4和模型5并不是较好的统计模型,方程中的大多数变量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参与网络中成员的信任还受到其他未知变量的影响,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代中国,普特南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中的信任生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通过参与网络的建立就可以产生的,其背后还包含更多的网络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公民参与程度与参与网络中成员的信任程度是具有正向关系的。而模型6的统计结果,市场化与公民参与的交互项对参与网络中成员信任程度同样是一个负向关系,这再次表明了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公民参与网络对于网络中成员的信任产生能力越趋于弱化。由此,我们的假设4,即如果市场经济确实在弱化社会成员的合作精神,那么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公民参与网络(形式性社会资本)生成的成员互助和信任(实质性社会资本)的能力将越弱这一假设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如图6所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带来了人们自主空间的释放(斜率的提高),使得公民社会的发展成为了可能。然而,当我们将这种自主能力控制了之后,从宏观上看,公民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也产生了一种抑制的效应(截距的降低)。我们通过理论探讨将这种抑制效应归结为合作精神、公共责任感的缺失。这样,假设1也在公民参与对于网络成员互助和信任作用这一内生结构中得到了印证(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参与和参与成员互惠信任的斜率降低)。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下,随着人们自主能力的提高,公民社会的发展将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然而,公民社会的建立不仅仅是一个人们能够拥有更多支配空

间和时间、更多参与路径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个具有合作精神和相互信任的公民参与网络的建设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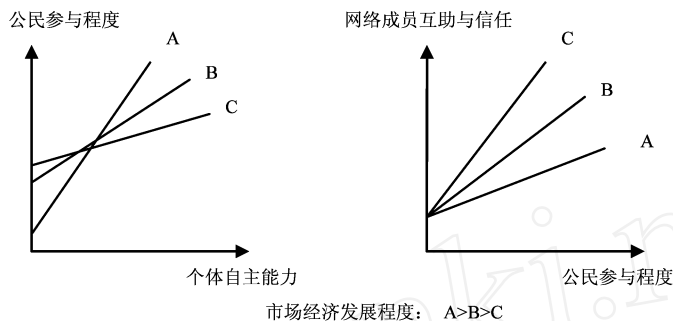


图6 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发展的关系模式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市场经济本身对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存在两种结构性效应。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成员个人资源动员的空间,给予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生活的路径,丰富了社会成员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上考虑,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中对自利行为的刺激,降低了人们的合作意愿与公共责任感。当我们把社会生活想象为一个愈趋华丽的剧场时,每个参与者前来观看,然而嬉笑怒骂之后,彼此没有留下联系地离开了。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

第二,由于合作精神的缺失,由更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带来的参与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一种“强参与”,因为其带来“实质性社会资本”增加的能力正在衰退之中。在普特南的研究中,公民参与的行为是带来社会资本增加的重要机制。他以此为衡量研究了美国社会资本的发展趋势,得出了社会资本正在“Declining”(下降)和“Disappearance”(消失)的结论(Putnam, 1993, 1995),尽管他的这种论断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引起了许多争论。我们在研究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内在于参与网络中的合作精神和公共责任感才是网络中互惠与信任产生的源泉。简单的出于兴趣和利益的参与,并不必然带来公民社会中“实质性社会资本”的增加。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997)开篇中写道:“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的幸福必备的条件,尽管除了看到他人幸

福他自己也觉得快乐之外,他从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其他好处。属于这一类的原理,是怜悯或同情,是当我们看到他人的不幸,或当我们深刻怀想他人的不幸时,我们所感觉到的那种情绪”。可以说,对于亚当·斯密来说,人的第一性是同情、怜悯之心,第二性才是自利之心,二者是完全可以相容的。同情、恻隐之心是自利之心的基础,在二者的自然作用之下,人类就会克制追求自身的幸福。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亚当·斯密对于人性的第一个假设正是一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参与繁荣,从而形成公民互惠和信任的精神内核,只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促使公民社会的产生。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正在诸多领域改变着我们社会生活,而在我们的分析中,从宏观的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们的交往和参与行为却愈趋于一种“弱参与”,这个“弱”不但体现在参与的抑制效应,同时也体现于公民参与网络在生产网络中互助和信任的能力正在下降。因此,当我们乐观地在政策分析中强调参与“量”的增加时,我们也需要反思,参与的“质”是否真的得到了提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是否正在遗失些什么?当回归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时,正如有学者对人们社区生活所作的分析那样,社区生活中的参与是“自上而下建构”的参与和“表演性参与”、“参与越趋向于个体化”(杨敏,2007;伯兰德、朱健刚,2007;黎熙元、陈福平,2008)时,对于我们公民社会的建设路径还需要引起更多制度上的思考。我们在本文中所要强调的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内生于良好市场社会中的价值观念和公民的行动理念同样需要我们去建构。

参考文献:

- 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2007,《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托马斯·潘恩,2005,《人权论》,迈克尔·基梅尔等编《社会与政治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储建国,1999,《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邓正来,1996,《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第15卷。
-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06,《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方朝晖,1999,《对90年代公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
- 高丙中,2006,《社团合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机团结》,《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高兆明,1999,《公民社会的建立与家族精神的破灭——兼论“公民社会”研究进路》,《学海》第

3 期。

格奥尔格·齐美尔, 2007, 《大都市和精神生活》, 载《阅读城市: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 郭子林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黑格尔, 1961, 《法哲学原理》, 范阳、张企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黎熙元、陈福平, 2008, 《社区论辩: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 《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林南, 2006,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张磊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林平, 2006, 《企业的社会资本: 概念反思和测量途径——兼评边燕杰、丘海雄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 《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罗伯特·D·普特南, 2001, 《让民主运转起来》, 王列、赖海榕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陶传进, 2003, 《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一种批判的视角》, 《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田忠, 2001, 《经济市场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公民社会》, 《理论与改革》第 2 期。

亚当·斯密, 1997, 《道德情操论》, 蒋自强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杨敏, 2007, 《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俞可平, 2006, 《中国公民社会: 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张喜红, 2007, 《社会团体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 《长白学刊》第 3 期。

Almond, Gabriel &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llah, R. N., R. Madsen & W. M. Sullivan 1981, "Democratic Culture or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Society* 18.

Bellah, R. N., R. Madsen, W. M. Sullivan, A. Swidler & M. T. Spitzer 1991, *The Good Society*. New York: Knopf.

Berry, Jeffrey M. 1997, *The Interest Group Society*.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Curtis, James 1971, "Voluntary Association Joining: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Not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Curtis, James, E. Gabb & D. Baer 1992,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Fifteen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Cutler, S. J. 1976, "Age Differences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Social Forces* 55.

Gamwell, F. I. 1984, *Beyond Preference: Liberal Theories of Independent Associ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ellner, Ernest 1994, *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New York: Allen Lane/Penguin Press.

Greely, Andrew 1997, "The other Civic America: Religion and Social Capital." *The American Prospect* 32.

Green, David, G. 1993, *Reinventing Civil Society*.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Health and Welfare Unit.

Hirst, P. Q. 1994, *Associative Democracy: New Form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Governance*.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Inglehart, R. & W. Baker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 Knoke, David 1986, "Associations and Interest Group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2.
- Knoke, David & R. Thomson 1977,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Trends and the Family Life Cycle." *Social Force* 56.
- Paxton, Pamela 1999,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 Popielarz, Pamela A. 1999, "Voluntary Associa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Gender Segregation i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Gender and Society* 13.
- Portes, Alejandro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l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1995,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 Rotolo, Thomas & J. Wilson 2003, "Work Histories and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s." *Sociological Forum* 18.
- Schofer, Evan & Marion Fourcade-Gurinchas 2001, "The Structural Contexts of Civic Engagement: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
- Scott, J. C. 1957, "Memb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
- Smith, M.J. 1990, "Pluralism, Reform Pluralism, and Neopluralism: The Role of Pressure Groups in Policy-Making." *Political Studies* 37.
- Tester, Keith 1992, *Civi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Wuthnow, Robert 1991, "Tocquenville's Question Reconsidered: Voluntarism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in *Between States and Markets: The Voluntary Secto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by R. Wuthnow.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责任编辑:张志敏

The Tournament System *Zhou Feizhou* 54

Abstract: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in the stag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s in the 1950s. Following the Pre-Soviet planning syste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uccessfully centralized the power to control for the mos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By launching a tournament among subordinate governmen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ried to explore a different way to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was the extreme centralization and tight control that resulted in the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by the tournament.

Market Transition and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un Ming* 78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people's 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market transi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both the marketization and rationality of individual self-interest affect people's preference to different principl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Statistical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ampling survey data of China (CGSS 2005) show that market distributive system makes the principle of equity legitimate and the principle is supported by upper classes, while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s split-consciousness, is preferred by the lower classes, which challenges the legitimacy of equity and market distribution.

Stronger Marketization, Weaker Participation? A study of pathway to civil society *Chen Fuping* 89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of market economy and civil society, and we find that there is more liberating space for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in the market society. But when controlling the influence of "space liberating", it also has a constraint of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by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 the meanwhile, we also find the ability of producing social capital by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is weaker in the higher level of market society. So the corporations of people and building of civic engagement network not only present in stronger "atomic" participation, but also require the spirit of corporations and sense of public liability. It is just the basic pathway to a good and effective civil society.

How Can Village's Sub-autonomic Organizations Be Cultivated? A political anthropology study of Liu Village's Old People Association in Zhejiang ...
..... *Ruan Yunxing & Zhang Jing* 112